

当今中国发展中的国民心态调整

孙时进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文革”的结束、“四人帮”的倒台,改革开放的实施,终于使得历经百年屈辱的中国逐步走上经济腾飞、社会发展的道路。然而,这并没有驱散百年的屈辱留在中国人心中的自卑的阴影和危机感。

改革开放 30 多年取得社会尤其是经济的进步使得中国有了向世界展现自己的能力。奥运盛会、“世博会”等规模空前的大型活动的举办,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在 20 国峰会、中欧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的地位上升,表明中国开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已经开始有了影响与改变世界的能力。历史悲情似乎正在慢慢淡去,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历史上经济的极度贫穷和政治的专制留给中国人心理上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并不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立即消除。国民心态的转变会滞后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这种滞后又会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只有对这个事实有所自觉,才能够摆脱恶性循环,以建立新的良性循环。

以“世博会”为例,7000 万人参展的数字确实创造了世界纪录,让世界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但这种追求和满足于“多”、“大”、“快”的

心态背后是否潜藏着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自卑和不安全,其基调似乎悲壮的。从深层次思考,这些做法并不一定能真的增加我们的民族自信、真正让世人接纳和认可我们,反而会给我们带来紧张和压力,使我们的幸福感降低,同时也会让世界感受到一种压力。

近代历史将中国生硬地拉入现代性的潮流中,因此,我们不断将近代的悲情历史告诉世人,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唤起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激励国人。诚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际形势紧张、国内百废待举的情况下,要想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去,以忧患意识为指导,激励民众吃苦耐劳的精神,确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选择。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一样,那时中国政治经济都面临极为严重的问题,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但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应该有不同的、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现阶段,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已从“世界大战是一定要打起来的”转变为“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构建和谐社会”,在经济上已从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又快又好”转为追求质量的“又

好又快”。因此,我们的心态也就应该是充满自信、有安全感,以从容、优雅、淡定为基调。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代之中国仍然处于缺乏民族自信的状态。曾经的历史悲情成了中国人驱之不散的心理阴影,在现阶段具体表现为焦躁、不安和愤怒的情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背着沉重的包袱,中国人始终怀着一种悲壮,处于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像阿 Q 一样,害怕别人揭自己的伤疤,害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这种心态,让中国过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一味地向周围的人和向世界证明自己做大事的能力;这种心态,让中国无法放下过去,无法接纳自己,也就无法真正的让世界认可中国,让中国获得真正的民族自信。

未来中国的发展,在国民心态上应该有以下调整和转变:首先,应该真正地接纳自己。自我接纳是自信的起点,它是指客观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评价自己,完全地接受自己,适当地宽容自己。无论是就国家还是就个人而言,自我接纳都是天生拥有的权利。只有真正做到了自我接纳,中国才能摆脱民族伤疤带来的恐惧感,使国民心态获得安全感。在安全感中,才能不卑不亢地正视现在的自己,才能树立平和的自信。在平和的自信中,才能摆脱一味用名牌、用奢侈品、用所谓“做大事”来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尊严和强大,从而才能以一种包容的心态促进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个性的发展,与世界各民族文

明进行分享交流,获得世界真正的欣赏与接纳。

第二,要认清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模式,逐渐将以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为目的的活动,向着以提高民众幸福水平为目的的创新转变。改革开放之前,从国民心态上来说,极度的贫穷必然给中国民众带来极大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的负面意义是使人的幸福感降低。但其正面意义是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中国人勤劳、节俭,去创造骄人的物质财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生存”这一需求已逐渐得到了满足,因此,恐惧感成为了一种落后于现实的“后遗症”。要摆脱这个后遗症,政府治国理念就应该向着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为目的转变。因此,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思想,坚持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强调对民众“幸福”需求的满足。

第三,给全社会每个人以尊严和生活的意义,促进个体的人格完整,让我们的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1](P189)}的社会。这种“以人为本”的社会,自然会是创新的社会、和谐的社会,同时也是幸福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责任编辑 张正云

Chinese Experie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National Mentality

Editor's note “Chinese experience” mirrors microscopic changes in Chinese people's values and social attitud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three deca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was adopted. Narrative about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merely studying “Chinese process”, namely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cro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is not complete. Chinese experience also adds more complete spiritual meaning and value to the so-called “Chinese process”, which, when come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dual perspectives to understand China's social changes or transformation. Furthermore, studies of Chinese experience cannot be one-dimensional. As a type of transformation-oriented personality or transformation-based social mentality,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 mostly characterized by its polarization or binary division, which finds the most typical connotation 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lements. The five essays in this volume have pointed out the actuality and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 referring to the binary division caused by market restructuring and changes in social mentality caused by credit crisis and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ey also give valuable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readjust the national mentality.